目　录

五四运动亲历记……夏明钢（1）
湖南学生的反日驱张斗争……蒋竹如（20）
回忆《新湖南》……龙伯坚（29）
新民学会点滴回忆……周敦祥（36）
衡阳五四运动的片断回忆……屈子健（38）
五四运动后湖南第一师范的教育改革……程星龄（43）
教育改革后的一师点滴……李维邨（54）
湖南五四运动二三事……陈漱渝（59）
片断的回忆……王肇勋（71）
留法勤工俭学杂忆……郭方瑞（73）
留法、比的片断回忆……林叔英（82）
驱逐张敬尧运动……肖仲祁（88）
湖南学界驱张运动前后……唐耀章（92）
驱张运动在衡阳……卫伦杰（101）
驱张之役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战斗经过……谢蕙韩（104）
关于张敬尧……许和钧（112）

回忆父亲杨昌济先生……杨开智（118）
回忆杨昌济先生……郭之奇（128）
杨昌济先生在湖南商专……李凤池（130）
我们所知道的杨度……杨友鸾　杨友鸿　杨友龙　杨友麒（137）
朱师晦的《癸卯日记》……袁鹤泉（14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柳直荀烈士在湖南……李[illegible]（147）
回忆柳直荀同学……袁鹤皋（161）
回忆大革命时期的柳直荀同志……陈[illegible]（164）

留法老学生之自述……徐特立（172）

夏曦同志牺牲的经过……袁福生（176）
罗宗翰先生生平事略……李维汉　易礼容（178）

五四运动亲历记

夏明钿*

五四运动是一次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对于这个运动，毛泽东同志曾经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并且指出，它"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毛泽东同志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是完全正确的。我曾亲自参与这一运动，觉得有责任就自己所知，将事实[illegible]写述出来，但为个人的见闻所限，自然难以写得全面正确。

一、五四运动时期北京知识界的思想概况

五四时期北京知识界思想文化活动的中心是北京大学。但北京大学在一九一七年以前胡仁源任校长时，可以说一点新鲜气息也没有，只是关着门读死书。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成功后，人们开始受到启发，当时有人写过"革命的西方，露出了人类幸福的曙光"的诗句，表现出对十月革命的憧憬。与此同时，西欧工人阶级在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李卜克内西等的领导下，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纷纷提出"争取民主自由"、"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

---

* 本文作者夏明钿，原名夏秀峰。

的口号。列宁也发出“全世界人类不分种族肤色，团结起来，维护和平”的号召。这些革命思想和口号，日渐传播到东方来，因而促进了北京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周国人等人的觉醒，并给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当时提出的口号是“[illegible]”（“赛先生”与“德先生”），[illegible]社会解放，如[illegible]打破[illegible]；在政治上主张集会、结社、[illegible]，在文学方面，主张[illegible]文代替文言[illegible]，[illegible]统治，[illegible]，其代[illegible]，[illegible]，尽管有反对力量，而“[illegible]”[illegible]阻挡的[illegible]，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外，[illegible]主义思想、[illegible]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illegible]传入。宣传[illegible]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国。就中在北京出版使著名的有《[illegible]》、《新潮》、《国民》、《每周评论》等几种，[illegible]。此为五四运动前后北京知识界思想活动的一般情况。

在[illegible]思想、新文化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中，除了[illegible]，[illegible]为代表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以外，应当特别提到[illegible]。如上所说，在胡仁源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北京思想界是“[illegible]缩影”，“暗淡无光”。而从一九一七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从那时起，北京知识界的思想活动，大大地活跃起来。记得当北洋军阀政府邀请刚从欧洲回国的蔡先生出任北大校长时，蔡先生曾经提出办学的三个条件：第一，提高大学校长的地位，由简任改为特任；第二，大学经费独立，由教育部指定经费来源，划归大学自己经管，其他方面不得过问；第三，大学校内一切学术活动完全自由，政府不得借故干涉。为了保证这一点能够实现，大学得自设校督，维

持校内秩序。这三个条件为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所[illegible]生才就任北大校长。蔡先生接任北大校长后，即着手[illegible]校组织，增设文科（[illegible]于现在大学的文学院），本着思想[illegible]、兼容并包的方针，聘请李大钊、陈独秀、周树人、钱玄同、梁漱溟、[illegible]、[illegible]等各有两翼各色各样的人物为教授，提倡学术上的自由争论。当时北大校内外先进与落后，[illegible]的[illegible]斗争，民主思想与封建思想的斗争，[illegible]一九一八年秋，欧战结束，在协约国的[illegible]之下，北[illegible]民[illegible]大会，会上蔡先生发表了题为"劳[illegible]"。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进步的表现。后来五四[illegible]，[illegible]力于北京[illegible]界的思想解放，也得力于蔡先生的[illegible]和支持。

二、五四运动的前奏——

北京四大学校学生的请愿和国民[illegible]

一九一八年五月，北京四大学校的学生，为了[illegible]政府借对德宣战，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缔结中日共同防[illegible]，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所谓四大学校，[illegible]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及北京[illegible]个高等学校。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借口对德宣战，[illegible]国民党争夺政权，非法解散国会，造成南北战争。[illegible]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国际帝国主义全[illegible]年经[illegible]政权于摇篮中，组织十四国联军，[illegible]。远东方面，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出兵西伯利亚。我国的军阀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签订所谓中日共同防[illegible]军事协定，并向日本举行大宗借款，即臭名昭彰的西原借款，用以讨伐南方。全国人民对于段政府这种出卖民族利益、卖权辱国的行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莫不切齿痛恨，群起而攻之。北京学生激于爱国热忱，纷纷集会讨论如何制止军阀政府屈从外寇的对策，恰好留日学生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我国内奸对我进行侵略，相率离日回国，并派代表赴各地活动，唤起国人，共挽国难。北京大学学生应留日归国学生代表阮湘、王复之请，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日晚在北大理科大楼内开全体学生大会，并邀北京其他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参加。大会决定于翌日上午九时齐集新华门前，向总统冯国璋请愿。这里须加补述的：当时有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学生张传琦（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于五月九日下午在工场实习时，痛国是之日非，切指立誓，表明他对段政府卖国罪行的坚决反对。五月十一日上午八时，也是在北京工业专门学校里，当全体同学在物理实验室里集合，准备会同北大同学前往总统府请愿时，这个学校的学生夏秀峰跳上讲台，悲绪激昂，讲了几句话，便抽出衣袋中的小刀，在左食指上割了几下，立时血流如注，即用血写了“此条约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一语，以鼓励同学奋勇前进。这两个割指写血书的事件，激发了工专全体同学的爱国热情，提高了大家的斗志。到总统府请愿时，工专学生去的最为踊跃。此次四大学校学生的请愿行动，除了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卖国罪行，表明人民的爱国意志以外，并未获得任何结果，但仍有其重要的意义：第一，它使学生受到一次斗争的锻炼，为五四运动作了组织工作和领导骨干的准备。自这次请愿以后，北京学生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己有组织起来的必要。经过短时间的酝酿，随即成立了北京学生爱国会。参加爱国会的，共有十六个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学生爱国会虽然只存在几个月，到一九一八年秋后便结束了，但它确为五四运动作了一些前期的组织工作，五四运动的领导人员也多数是从学生爱国会的骨干中产生的。第二，这次请愿的行动相

当和平和有秩序，对军阀政府起了一定的麻痹作用，使它后来在五四这一天戒备不足，为学生的革命行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下面再谈谈国民杂志社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北京学生爱国会成立后，在学生内部作了一些宣传鼓动工作。但是大家感到光是北京有组织还是不够，应该把这种组织扩及全国各地，以便在行动的时候，彼此能够互相呼应和支援。于是趁着暑假期间，分派同学至上海、天津、南京等处进行联系，希望这些地方也把学生爱国会组织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在上海组织全国学生爱国总会。但因当时全国各地的学生还不是和北京学生一样有组织起来的要求，因而北京学生在上海等地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把全国学生组织起来的计划，终未实现。但北京大多数学生并不因此灰心。他们继续奋斗，邀集同志创办了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月刊（现在还存有一九一八年十月号一期，陈列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供参证）。参加国民杂志社的学生，我所能记忆的有：北京大学的易克嶷、许德珩、邓康（即邓中夏）、段锡朋、周长宪、杨志哲、陈锡、黄建中等；高等师范学校的熊梦飞、匡济（即匡互休，后号互生）、俞劲、周恕群等；工业专门学校的肖镇湘、方乘、夏秀峰、张传琦等。还有其他学校的一些学生。这一批学生团结在《国民》杂志社里历时一年多，中间经过五四运动这个大风暴。他们在五四运动中起到了出色的领导骨干的作用。由此可见，《国民》杂志社与五四运动是有其不可分割的关系的。

三、五四运动的大略经过

1.五四前夕北京学生运动的酝酿

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通过巴黎

和会使其对我国山东的侵略成为合法化。这桩历史事实，已属众所周知，无须赘述。

当时由于我国政府腐败，内战频仍，国势羸弱，帝国主义列强根本不把我国放在眼里，加以政府内部有亲日卖国贼的活动，日本帝国主义又与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勾结，得到他们的支持，我国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失败已成为无可挽回之局，和约只待各国代表签字，即成定论。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心鼎沸。各政党和人民团体，纷纷自动集会，商讨对策。北京学生尤其愤慨万分。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各按其自己的条件，举行了大小集会，讨论巴黎传来的不利于我国的消息。有的主张仿照去年的办法，集合全城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向军阀政府请愿；有的主张向英美法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通电，请求它们主持正义；也有主张仿照留日学生怒送章宗祥（我国驻日公使）回国的办法，到卖国贼曹汝霖等人的住处示威，把卖国贼痛骂一顿。当时议论纷纭，各有道理。其时有多数学校的学生组织了宣传队，[illegible]，[illegible]民众，反对日本侵略我国。[illegible]系领导下的国民外交协会，也拟于五月七日（即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在中央公园（现在的中山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订包括山东条款在内的凡尔赛和约。北京学生为了避免与中国政治史上臭名昭著的进步系混在一起，特提前于五月三日晚上集会于北京大学法科礼堂，商讨如何组织这一反日爱国运动。到会学生人人义愤填膺，大声疾呼，一致主张一面电知巴黎和会我国首席代表陆徵祥（外交总长），责成他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一面号召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于次日（五月四日）下午一时到天安门集合，开北京学生团体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赴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请愿"，要求各国驻华公使转请他们的政府[illegible]

正义。这里需要说明的，即到这时为止，并无学生提出要到[illegible]长楼胡同去打曹、章、陆卖国贼的计划。正因为事先没有这种计划，北京学生才能在五四这天无阻碍地集合于天安门。如果事先有此计划，势必声张风声，军阀政府定会采取预防措施，学生的行动就会受到阻碍。

2.天安门大会与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的"请愿"

五月四日下午一时左右，北京学生按照先晓在北大开会的决定，到天安门集合。到会的人非常踊跃，总数约有万人左右。国立北京八大学校的学生大都都参加了，各私立高等学校，各公、私立中学，以及各部办的专科学校，如俄文专科学校、交通邮电专科学校、高等警官学校等，均有学生参加。会场没有设置讲台。学生们就以天安门前的石狮子作讲台。演讲者站在石狮子头上讲话，情绪激昂，言词锋利，富有煽动力量。当时京师警察厅派了警察到场，名为维持秩序，实则前来监视。前清进下尚未整废的"步兵统领衙门"的头子李长泰，也在这时领着一队服装褴褛、士气萎靡的士兵前来干涉，说了一些"你们纠众集会，妨碍治安，应即解散"的胡言乱语。当有学生把李长泰怒斥一顿，说："我们在这里开会救国，秩序很好，你到这里来捣乱，才真是妨碍治安。你给我们滚出去！"李长泰受了群众这番正义的斥责，只好灰溜溜地率队离开，群众大会也就顺利地开了下去。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有北大、高师、工专、俄专等校的学生代表。讲演完毕后，按照预定计划，大家整队前往各国公使馆"请愿"。队伍从天安门出发，经中华门绕前门楼到东交民巷西口，便遭到守卫的美国兵的阻挠，不得前进。（东交民巷为各国驻华使馆所在地，根据"辛丑条约"，各国有在这里驻兵的权利，全区由外兵分段把守，我国任何武装人员都被禁止通行，即使是和平居民，也都不许整队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去。这是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最使国人痛心的事情。)学生要求派代表进去，也遭拒绝，上“请愿”书也不收受。原先有些人对美国抱有幻想，至此才看出他们是一丘之貉。漫长的队伍被阻在东交民巷西口约半小时以上，没有任何结果。群众愤怒万分，异口同声喊出“到赵家楼胡同找曹汝霖等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大家高呼口号，向赵家楼胡同进发。

3.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

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分东西两院，东院为西式楼房，西院为中式平房，共一张大门出进。这时大门关得紧紧的，用铁杠杠了，学生无法进去，便在门外大声怒骂，并将写着“打倒卖国贼”等标语的小旗帜扔进屋去。这些都不能触动曹汝霖等卖国贼的一根毫毛。那末怎么办呢？群众自然有办法的。前面说过，五月三日晚上在北大法科开大会时，虽然群情激愤，也只决定要到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家门前去游行示威，并无人公开提出要对他们动武。可是学生中确也有人暗地作了一些采取激烈行动的准备。记得五月四日清晨四时左右，天还没有大亮，高等师范学生匡济，就到北京工专学生夏秀峰宿舍里找夏（夏住在北京西城大觉胡同十号榆园），告诉夏一件这样的事：他（匡）和北京高师几个学生组织了各校一批同学，原来打算在进步系的国民外交协会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请曹汝霖等出席受质询时，将曹等当场打死一两个，以快人心；但现在的情况变了，北京学生今天来个示威游行，一定会把卖国贼吓住，再不敢于五月七日到中央公园去出席会议，他们原来的计划须提前于今天执行，无论到那一个卖国贼的家里去（因此时还不知道一定是到曹汝霖家里去），就在那里动手，能打倒一个卖国贼，就是好的。夏领会并同意了他的意见，即请匡去约其他同学，以免在这里多谈，泄

露机密（因与夏同住的还有其他几个学生）。匡并告夏，他已到北大约了陈锡，还拟去法专邀约谢澹。陈、谢二人，都是匡的宝庆同乡，匡认为是靠得住的。五四那天，当学生群众到达曹汝霖家门前不得其门而入的时候，匡济从西院窗口将铁栅扭弯了两根（匡在少年时就练就了一手好内工，他只要用手一捏，就能够把弯的铁门扣捏直，其气力之大有如此者），打开了一个缺口，他从缺口爬进去，撑开守卫的警察，将大门打开，群众便蜂拥而入。当章宗祥化装偕同另一日人夺门而出，行至东院门口时，有人从袖中取出照片对照一下，断定其中一个不是日本人，而是章宗祥。这时群众一涌上前，把章扭倒，大打起来。由于同行的日人全力掩护，群众又系初上战场，不明情势，唯恐伤及日人，惹起外交纠纷，致章未受重伤。群众散了，章爬起来就走，又被发觉，再次挨打，他装死躺下，群众方才罢手。当东院这边两次轰动起来痛打章宗祥的时候，西院学生中有人点火烧屋，顷刻之间，浓烟上冲，透出屋瓦。群众见屋内已经着火，于是纷纷散去，章所以未被打死，西院房屋过早着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等到大部分群众远离赵家楼胡同之后，警察才赶到现场，拦截了三十几个学生，作为这次"造乱"的"首要人犯"，将他们逮捕起来。

从以上事实看来，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这一壮举，不仅为军阀政府所未料及，即在学生群众中，也不是全体都有思想准备的，就是说，是在一部分学生有准备，一部分学生无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次学生的革命行动，充分表现了群众的伟大力量。至于它的巨大深远的历史意义，人们在当时是没有意识到的。

4.北京学生的政治要求与学生联合会的组织

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在赵家楼胡同惩罚了曹汝霖、章宗祥之

后，除了被警察捕去少数人以外，其余都回到了学校。因时间已晚，没有仔细清查人数，虽知有同学被捕，但被捕的是那些学校的同学，有多少人，都不清楚。第二天各校经过认真的清查，才把情况摸清，被捕同学共计三十二人，其中北大同学占了一半。此时又风闻军阀政府将把被捕同学交检察机关起诉，并拟判处重刑，同学们无不切齿痛恨。于是各大中学校无形中把课停了，集中力量营救被捕同学。在营救被捕学生的运动中出力最大的，首推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和他所领导的北大教职员及学生。当学生未被营救出狱以前，蔡先生和北大许多教职员日以继夜地到处奔走，希望被捕同学早日恢复自由。直到五月六日深夜，蔡先生与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达成协议，吴担保在七日上午七时以前释放被捕学生；蔡先生担保学生不去参加七日进步系领导下的国民外交协会在中央公园召开的国民大会。双方履行协议。五月七日上午七时以前，被捕同学全部获释。五四学生游行示威这件事的本身，至此告一段落。

现在续说五四学生运动如何向前发展。五月四日北京学生虽然给了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以初步的惩罚。但他们仍然窃据高位，一旦再有机会，仍可窃权弄柄，卖国求荣，给国家民族造成严重的损害，这是学生和人民所不能容忍的。北京各校学生紧接五四游行示威以后，于五月五日上午集会于北大理科，筹商今后进行的方策。讨论结果，除了努力营救被捕同学以外，决定向军阀政府提出如下的一些政治主张和要求：(一)坚决拒绝在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条款上签字；(二)严厉惩办曹、章、陆等卖国贼；(三)外交公开，坚决反对秘密外交；(四)人民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学生组织学生会，政府不得干涉；(五)男女公民在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一律平等，全国各公私立学校对妇女开放，实

许男女同学；(六)反对旧礼教，废止祀孔等制度，采用白话文，废止文言文。这六条政治主张和要求，是从学生代表的无数意见中经过详细讨论归纳出来的，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时代意识，为大多数群众所拥护。学生代表们还考虑到自己如不组织起来，便不能促进这些主张和要求的完满实现。他们自五月五日起，日夜不停地开会，一面继续讨论向军阀政府提出的主张和要求，并研究如何才能促其实现；一面推出段锡朋（北大代表）、程秋白（原来不是这个名字，但已忘记，只好写今名，他是俄文专科学校的代表）、夏秀峰（工专代表）等三人为起草人，草拟学生联合会的组织章程。章程草案于五月六日脱稿，经过一整天的讨论即被通过。学生组织正式定名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作为北京学生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学生联合会组织分两大部分：一为评议会，由中等以上学校每校选出学生代表二人（北大八人）组成，所有学生联合会的重要事宜，均须经评议会决定，方得执行。一为干事会，即执行机关，在相长一段时间内由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干事会代行其职务。北京学生联合会评议会的主席，亦由北大学生出席评议会的代表担任。各校学生会，也都设评议会和干事会。学生会实行集体领导，不采会长制。各校评议会设评议员若干名，一般以班为单位，每班选出代表一至二人参加；干事会各股主任为当然评议员，并以总务股主任为评议会主席，均由选举产生。当时北京大学学生在学生联合会评议会和干事会任重要职务的，有以下一些人：易克嶷、段锡朋、许德珩、周炳琳、张国焘、陈宝锷、方豪（还有一位，忘其名）等八人为北大学生出席学生联合会的代表，易克嶷为干事会总务股主任，邓康为宣传股主任，罗家伦为外交股主任，傅斯年为文书股主任，康白情为交际股主任，陈钧为庶务股主任。

5.北京学生大罢课与挽留蔡元培先生

上面说过，被捕学生经蔡元培先生和其他各方面尽力援救，已于五月七日上午七时以前全部获释。这时忽然传来消息，说蔡元培先生出走了。事情是这样的：五四事件发生后，北京有势力的反动集团，主要是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丑类以及知识界中一些落后分子，以为这次运动，是蔡元培先生等指使学生干出来的。他们对蔡先生恼恨达于极点，必欲去之而甘心。据说从五月四日晚上起，到五月七日晨，蔡先生接到的匿名恐吓信不下百余封。蔡先生因为尚未把被捕学生营救出来，才置自己的生死于度外，坚守岗位，进行斗争。待到吴炳湘担保释放被捕学生之后，蔡先生便急流勇退，买了一张三等车票，离开北京到杭州去了。临行前，在北京《晨报》登了一个启事，全文已记不清，只记得其中有"吾老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之句。当时许多学生读了这个启事，都十分激动，竟有痛哭流涕者。蔡先生这种不避艰险，不畏强暴，保护青年的高尚品格，至今仍令人难以忘怀。北京学联（即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简称，以下仿此）得到蔡元培先生离京回杭的消息，立即断定，这是军阀政府对蔡先生施加压力的结果，全体代表一致反对军阀政府这种卑鄙行径，要求挽留蔡先生回任北大校长；并把它列为政治要求的主要条款，迫使军阀政府接受。此事经学联数度与政府交涉，均遭到顽固的拒绝。学联遂于五月十日作出决定：从五月十一日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举行总罢课（在这以前已有一些高等学校如北大等处在停课状态中），并布置各校组织讲演队，上街讲演。其办法是：每校按学生人数多少，组织若干队（每校至少五队），每队又分成若干组，每组五至十人，学生人数太少的学校可以不分组。每日每校派一队以上的学生出动讲演，以唤起民众，共同救

国。本来，在学生运动初期，也有学生上街讲演，不过出动人数有限，影响也不大。这次不然，全城几十个大中学校的学生都出动了，每日有几十组多到几百组学生在街头讲演，弄得满城风雨，人心翻涌，致使军阀政府惊慌失措，坐卧不宁。

6.袁锡涛、姚憾吾的出面“调停”

北京军阀政府既害怕学生罢课和上街讲演，又不愿接受学生的要求，实行武力镇压，又怕把事态扩大，便企图用欺骗手段来达到消弭学生运动的目的，于是演出了“调停”的一幕。它（军阀政府）指使袁锡涛（教育部次长，其时教育总长为傅增湘，五四事件爆发后辞职，由袁代理部务）、姚憾吾（私立中国大学校长）等出面，到学联来进行所谓“调停”。本来调停人还有范源濂，但范知趣未来。袁、姚等人无非是用各种花言巧语，骗取学生取消讲演，恢复上课，一句话，就是不让学生有任何举动。对于学生提出的政治要求，则多方搪塞，说些冠冕堂皇的空话，甚至公然为军阀政府辩护，对学生施加压力，说什么：政府爱国不敢后人，绝不断送国家的权利；挽留蔡孑民先生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政府对蔡先生倚畀方殷，没有不挽留之理；至于罢免曹、章、陆，属于政府的职权范围，学生不应加以干涉云云。他们站在什么立场，不是很清楚吗？北京学联最初为了表示接受调停的诚意，决定于五月十七日起暂停讲演，静候调停。经与袁、姚多次周旋，袁、姚亦曾列席学联评议会的一两次会议，进行折冲，学联决定把自己的要求缩减为三条，即：（一）对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条款不予签字；（二）罢免曹、章、陆（原来提的是严厉惩办卖国贼曹、章、陆）；（三）挽留蔡元培先生（要求由政府派职位相当的代表会同学联的代表和北大师生的代表一同前往杭州欢迎蔡先生回校）。其余有关集会结社自由，男女平等，推行白话文等

项，作为次要项目，暂时不提。这三条仍然遭到军阀政府的拒绝。袁、姚反而向学联提出：要学生立即恢复上课，否则，他们就不再担任调停了。学联当然不能答应。至此，袁、姚"调停"的把戏，便以未获任何结果而收场。

7."调停"无结果，军阀政府下戒严令，镇压学生

北京学生的政治要求既遭到军阀政府的拒绝，学生是否继续罢课，在学生内部，是有分歧的。这里不妨追述一下斗争的经过。当袁、姚等到学联来进行"调停"时，他们是软硬兼施。特别是袁锡涛，在施用软化学生的手段时，在评议会上讲话，装腔作势，说得痛哭流涕，如丧考妣，竟图使人相信，似乎他是一个最关心学生利益的头等好心肠的人；另一方面，他又威吓学生说：如果不恢复上课，政府为维持治安计，将要下戒严令，严惩妨碍治安的坏人，此时如果学生牵连进去，受到政府的惩罚，他就爱莫能助了。经他这一威吓，评议会在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开会时，有若干学校的代表就表现动摇踌躇，不敢拿出积极的主张来，甚至有反对继续罢课的。既然评议会中意见不能统一，学联只好作出决定：各校代表把袁等要求学生复课的意见带回学校去，于当晚（即五月二十六日晚）召开各校学生全体大会，进行讨论。各校开会的结果，绝大多数学生主张继续罢课，坚持到底。北京大学绝大多数同学，也坚持这个主张。但北大学生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等少数几个人却另有所图。他们在大会上散发"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的传单，要求同学们"一面恢复上课，一面力争外交的胜利"。北大广大学生群众的斗志坚强，不为他们的妖言所惑，他们瓦解学生爱国运动的阴谋不仅未能得逞，而且激起了群众的公愤，北大全体学生大会作出决定，责成该校出席学联的代表向学联评议会建议，把罗、傅、康开除

出学联干事会。据说北大学生山东同乡会当晚也召开了会议，将傅斯年打了一顿。二十七日下午学联评议会开会，听取各校代表带来各校全体学生大会的意见，当即一致通过决议：继续罢课，坚持与军阀政府作斗争，务必迫使军阀政府接受学生的三项最低限度的正义要求，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同时，接受北大学生代表的提议，将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三人开除出学联干事会。在学联评议会开会时，袁锡涛、姚慕晋等又跑来探听学联的态度。当他们知道学生的意志坚定，学联决定继续罢课之后，于无可奈何之中，只好夹着尾巴悄然离开学联。继之而来的是北京学生与军阀政府之间的一场更加激烈的斗争。

二十七日下午，袁、姚二人离开学联以后，评议会继续开会，除了维持原决议继续罢课以外，还决定(一)恢复讲演，唤起民众和学生一道对军阀政府进行斗争；(二)立即派代表与北京商界联系，定于二十八日下午在北大法科礼堂开商学恳亲会，邀请商界代表及知名人士出席会议，商谈共同救国事宜；(三)选派代表赴全国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南京、广州以及沿铁路线工人聚集较多的唐山、长辛店、济南等地去活动，促使这些地区的工商学各界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为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作有力的声援。就在同一天(二十七日)，军阀政府也作了镇压学生运动的准备。各重要学校如北大、高师、工专等校门内外，均派有成队的武装警察驻守。他们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并且架起帐篷，作出长期驻扎的姿态。二十八日下午各校学生代表作为商学恳亲会的主人大多数都到了北大法科礼堂，商界也来了一些代表。此时，驻在北大法科的几个警察头目，头戴金边警帽，身穿白色制服，腰系拖地指挥刀，在会场内踱来踱去，口中喃喃叫嚷："今天戒严，不准开会，开会咱们就要抓人！"杀气腾腾地监视着到会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